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四期 ——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1e)

| | | |
|--------|----------------|-----|
| 【文学评论】 | 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 梅振才 |
| 【亡灵祭坛】 | 卞仲耘与宋彬彬——符号的意义 | 文 军 |
| 【自由论坛】 |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 (下) | 任不寐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学评论】

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 梅振才 •

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 126 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1、“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2、“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1973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3、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英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1、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1966年6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一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萎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2、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1966年4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

《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裤裯。“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3、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1958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4、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未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33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阅《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

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阙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5、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6、“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日，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批判曰：“韩侯，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1、“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1917年生于北京的李锐，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1980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1967年4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颌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2、“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归国，长期作报X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

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1967年12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Q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怙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1966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1975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3、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

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1973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1973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1977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1974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4、“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1941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

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966年10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中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1969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1978年11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198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辑，第三辑《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1988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2005年10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1972年1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阙《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1967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1. 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2. 史无前例的惨酷

1968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箕痛相残。”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3. 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4. 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1969年冬天，年届73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紵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5. 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6. 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X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7. 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2005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緲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8. 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

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1、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1967年1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1967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羨，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2、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可见。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3、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邵燕祥干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4、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5、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1967年7月1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日，入党35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1. 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2. 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樁重要事件，在事发40年事止30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记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3. 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徨。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

~~~~~

## 【亡灵祭坛】

卞仲耘与宋彬彬——符号的意义

• 文 军 •

卞仲耘是一个符号，是那个时代“被迫害致死”的符号。这个符号似乎很平淡，既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这个死亡并不具有教育意义，于是媒体本能地加以封锁，而人们对此更是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个符号不同于张志新，批准杀她的人属于“四人帮”一伙，需要一根棍子打击他们，至少可以算“再踏上一只脚”吧！也不同于王申酉，他是被“两个凡是”派杀的，于是投鼠忌器般不宜张扬。而卞校长之死，是文革暴力的符号，属于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作为符号，它代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成千上万各阶层民众。

“宋要武”则是另一个符号，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符号。这个符号经“伟大领袖”赋予神圣意义，各种媒体大肆宣传，顿时涂抹上了惊世骇俗的色彩。它一经确立，举国上下都发疯了。要命之处在于，这个符号是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走红的，说话听音，锣鼓听声，它意味着“伟大领袖”支持这个暴力，而且还不够，“要武啊！”按照当年“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这个符号就是掀起杀戮狂潮的符号。

两个符号组成一对矛盾，相反相成，加害与被害的和谐：加害者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受害者忍气吞声冤沉海底，这种和谐构成了毛时代那种“莺歌燕舞”。其实，又何止于此？自打“反AB团”开始，受害者自认倒霉，加害者弹冠相庆，已经成了惯例。尤其是那次“反右派”，这个民族最后一点思维能力也被绞杀殆尽，国民全体堕落成权力的奴婢。本来，倘若改革开放果真如邓公所说是“第二次革命”，那么首当其冲应该彻底清算“反右派”的罪行和它的危害。然而，留下四位死者与一位生者“不予改正”，不仅证明“第二次革命”只是说说而已之外，还充分显示了权力之傲慢。“扩大化”竟至十一万倍之巨，除了蔑视全人类的智商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死者长已矣”。卞校长被她教育出来的学生一拳一脚地打死，而且凶手都是些花季少女。这是需要足够的兽性的，比本·拉登那些“革命烈士”瞬间引爆炸药包需要更多兽性，否则不可能对朝夕相处的师长折磨致死。如此教育制度之神威可见一斑，什么样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如此丧失人性呢？当然只有剿灭人性的教育体制，而这个体制是否受到反思并脱胎换骨？我们只能各执一词了。

“存者且偷生”。没有人去追究“宋要武”的责任，她本人以及那些同情者都有说道，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应该由她背负一生。这使我想起纳粹头号电影宣传大师里芬斯塔耳那句著名的辩护词：“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就否定我的一生！”里芬并没有动手杀人，宋彬彬也许同样没有；里芬用她的艺术宣传鼓励杀人犯，宋彬彬则用她的权力纵容了杀人；里芬被盟国军事法庭判刑四年，“宋要武”则一路青云，享受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享受的待遇。里芬是认罪的，虽然只认了七个月的罪。“宋要武”却连一个“对不起”也不用说。

这个符号的代表意义，我们借韦君宜先生的评述：“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同学生打死校长的始作俑者相提并论的，但我们是否在选择遗忘、拒绝反思方面有相同之处呢？

这个符号又是有大环境支撑的。众所周知，当初最高层将文革定性成“十年浩劫”，邓公并明言否定文革之举为“第二次革命”，可见其深恶痛绝的程度。然而奇妙的是不准探究。我们看见，所有那些遭遇批判的、身陷囹圄的、驱逐出境的文化人，例如最近逝世的包遵信先生，都是不听禁令深刻反思文革的主。

此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重新标榜“宋要武”的举动，其实只是国内一系列复辟举动中一朵浪花。若不是“宋要武”当年太有名气了，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名气，根本不会引起网上的轰动，不愿意“且偷生”的那些人表示了他们的愤慨。当然只是熟知这个名字的那些人，对于年轻人而言，谁是宋彬彬，谁是“宋要武”，已经不重要了。

当国家经济取得较快速的发展时，一种复辟的暗流也在涌动，这就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宋要武”立牌坊的缘由。现在看文革，除了批斗老干部属于“浩劫”之外，其余的基本都翻案得差不多了，例如曾经控诉说“举国上下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而今高唱不衰，甚至连国家歌剧院首场试演就是“样板戏”。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文革时根本不存在的“毛戏”，如今愈演愈烈了。正是有这样的大环境，“宋要武”也按捺不住浮出水面跻身名人行列，并且不是以她的事后业绩，而是依仗当年的“革命行动”。

多余的话似乎不必再说，我们并无能耐改变什么，只有靠着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发牢骚罢了。但这牢骚至少可以抚慰那些亡灵，以及我们自己的良知。

~~~~~

【自由论坛】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下）

• 任不寐 •

◇ 文革与信仰之冲突

在理性领域，本文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毛要发动文革所以刻意毁灭基督信仰。本文的观点乃是：第一，客观真理：因为没有基督信仰，必然发生文革运动；因为文革的所有罪恶都为圣经的戒命所禁止，包括杀人、抢劫、强迫等，特别是偶像崇拜和人的骄傲，为圣经最大的戒命所禁止；因此我相信，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文革式的悲剧。第二，主观责任：由于没有对真神的敬畏，一方面人必然“大无畏”，并把自己当神；另一方面，这些假神或每一个假神存在的主要价值是打倒另外所有的假神，并在这种否定运动中谋取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第三、历史责任：为了上述目标，必须进一步毁灭基督在这地上的余民，一方面，所有的独立信仰与毛的个人崇拜及党的极权目标冲突；另一方面，基督信仰毫不妥协地拒绝向任何偶像低头；结果客观上中国因为消灭了信仰自由也消灭了所有自由。

一位当代美国神学者将美国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因此必然是对自由和真理的威胁。首先共产党是不敬神的，并以领袖、党、人民、民族、国家取代神。这些神从不自我否定，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否定别人，并不惮以暴力和杀人来毁灭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尊严。不敬神的结果是不尊重人，不相信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动物。事实上不相信神也意味着不相信末日审判，因此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对罪恶的批评，因不相信审判而免除了犯罪的绝对恐惧。无神论者可以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味反对权威，仇恨富人、甚至反对父母和家庭，也不重视私人财产。共产党不重视真理，谎言、做假见证成为政治的本质。共产主义鼓励仇恨、制造贫困，极度贪婪却否定获利的正当性。共产党否定原罪，因此不可能建立限制政府。他们不择手段在世界上建立道德王国，他们不容忍任何自由和批评，结果建立了一个一个道德集中营和人间地狱。（40）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我不否认文革是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毛派分子与党的冲突，也不否认文革是所有人所有人的冲突；我的观点是，这所有的冲突在理性上起源于灾民不可调和的生存战争，而在信仰上根植于人与神的冲突，根植于人的理想狂妄和人的信仰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通过以巴弗案来进一步说明这根本冲突的性质，毛泽东与吴维尊之间的征战展示了文革危机的神圣奥秘。（41）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份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

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吴维尊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

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详离世。

吴维尊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不在于吴维尊主动要与毛泽东征战，正相反，这场冲突之所以是真正的冲突，乃是因为吴维尊根本不想与毛泽东冲突；仅仅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地坚守信仰而被毛视为对自己构成冲突。这种冲突超越了平面上的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是因为顺从真理不得不在信仰毛泽东还是信仰耶稣之间作出选择。这不再是世界内部的对立，不再是因为世界内部的对立进一步更深刻地对世界之王表示孝顺。这种对立乃是因为自由。这种选择在逻辑上并不造成对任何他人的伤害。但是，这种信仰必然造成对假神事业的威胁。对于所有偶像来说，不在自己金像面前的下跪者就是敌人，而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直立者将成为文革伪神主义运动的真正障碍。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然而假神事业宁愿要仇恨也不愿意容忍被宽恕——被宽恕意味着自己仍然是有缺陷的，而有缺陷的就不是神。

文革与吴维尊的信仰是完全对立的。在消极方面，为了文革事业必须消灭吴维尊式的信仰；在积极方面，为了使自己成为神必须发动文革——这个神以及所有参与这位假神事业的民众也奢望同时分享假神的荣耀，成为大大小小的神社——文革假神事业的的目的确不是神圣的，乃是为了可以无所不为、无所顾及地占有别人的财产、地位和心灵。先肯定自己是神，然后实现灾民理想：否定他人并剥夺他们。然而无论是肯定自己是神，还是否定他人是人，都与圣经两条最大的戒命所禁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

文革派首先否定有神，并通过这种否定肯定毛是神。而由于毛是神，跟随者也获得了神的荣耀和权力。假神不是要神的爱，乃是首先要神的权力，其次要神的否定权力——象神一样论断善恶。假神事业是一个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否定有神、肯定自己是神；

这个假神可以否定他人；否定他人造成的罪恶感通过进一步肯定自己是神而消除；但自知毕竟不是神而进一步否定神以免除最终审判之大恐惧。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与基督信仰发生冲突。在这世界上存在很多宗教，也有各种哲学，这些观念或者支援和部分支援文革的假神事业，或者漠不关心文革的假神事业，对世界完全置身事外，或者只是某些环节反对文革的假神事业。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是文革的假神事业每一个环节都加以否定，而且是不屑否定的否定，一种绝对之“不！”。这个绝对之“不！”并非为否定而否定，而是为了绝对之“是！”。基督信仰的终点不是“无”，乃是“一”，是一切。“福音不自我解释，也不毛遂自荐；福音不乞求，也不谈判；福音不威胁也不允诺。……然而在基督身上，上帝道出了他的真情，揭露了这个世界上的非上帝的谎言。通过否定我们的现状，上帝肯定了他自己”。（42）

所以不难理解，汉语政治可以容忍甚至利用任何宗教和哲学，但对基督信仰和基督教神学势同水火。毛泽东一直对佛教抱有好感。毛1955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谈到：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毛同班禅谈话中再次重复这一点：“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22日毛再次告诉班禅：“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参学、懂经，成为佛学知识份子”，1975年6月毛会见外宾时的谈到：严复和“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毛后来在审阅《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特别加上这样的批示：“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然，毛的骨子里是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法家哲学的真正信徒。1964年8月18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赞扬庄子：“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人，敲盆而歌。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毛似乎也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与回教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5月25日，毛在陕北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宣布：“我们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43）

在毛看来，“唯心论”也有“反动的唯心论”和不反动的唯心论之分，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44）基督教无疑属于前者。基督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拒绝接受任何假神崇拜；并宣称任何伟大光荣正确的人都是罪人，并且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早在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七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45）

毛泽东对基督信仰的敌意不是没有“理由”的。更早在1924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201条针对共产主义的兴起就明确提出：“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当时中国右翼知识份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基督教界一直反对共产主义，因为福音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

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假神取代真神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

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1949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46〕

不容否认，毛镇压基督信仰获得了无神论知识份子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合作。事实上，毛泽东不过是领导三百年文革的精英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已。儒释道禅哲学一并鼓励人可以成为神，而基督教的原罪观和末世论是对肉身成道的“神圣事业”的绝对侵犯。面对这种外来对神州的真正侵略力量，知识份子中的假神精英一直站在非基运动的前线。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 1905—1998）在分析沈雁冰的反宗教心理根源时谈到：

“沈雁冰是官僚主义阶层中的一员。这种官僚体制则是几百年来各种势力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而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47〕

中国知识份子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需要补充的是，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专案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偶像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份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由此不难理解，当前文革反思最高的深度到康得、哈耶克和汉娜—阿伦特为止，而在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中，仅仅无神论的部分常被引证。事实上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批判，〔48〕不过是重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洞见。〔49〕而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看法，乃是从柏克的相关批评所依据的宗教传统中获取灵感。没有人否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是一个基督徒对无神论暴政的忍无可忍。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开始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然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

被摧毁。“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极权主义蔑视合法性：“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我们再看看托克维尔怎么说：

（在法国大革命中）不是坏法律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教会自然与所有要废除的古老制度结为一体，毫无疑问，这场革命必当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动摇宗教；从那时起，无法说出革新者一旦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对人们的想像力所加的一切束缚，他们的精神会被哪些闻所未闻的鲁莽轻率所左右。但是认真研究过国家状况的人本不难预见到，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49）

勒庞揭示了这场“最不人道的革命”乃是基于“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50）但是，勒庞毫不保留地服庸柏克的观点：

大革命中的激进派曾经力图普遍地改造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推行户籍身份非宗教化，在最激进的地区掀起了一场毁坏所谓天主教的“外部标志”的风潮，砸烂教堂中的圣物圣像，在圣母教堂前焚烧圣经中君王的模拟像……我们无往而不在服从与受支配之中，虽然现实生活中有上下之别，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但所有人生下来都同样要服从那永恒而先在的伟大法律（上帝、自然之法）……如果人对人的支配都是上帝的安排，那么这种支配就必须受到上帝所给予的永恒法律的制约。（51）

所有文革的研究和反思都抱有这样一种善意：让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能避免文革暴政的伤害。与此相关，“中国能否避免下一次文革”，“文革会不会再发生”，也成为文革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文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生，也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小规模地发生（到处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狂妄，到处是形形色色的多数暴力）；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继续任凭自己挣扎于“有灾变无信仰”的沦陷状态中，文革将继续发生，并将作为更为严重的惩罚而超越过去的危害程度。文革一直存在还将继续存在，这种悲观现状与前景更与三年文革之后的反思局限有关。

人们将导致文革暴行的那种现代性思潮视为避免文革的出路。这种现代性思潮就是所谓的启蒙思潮，在“重新启蒙”、“启蒙万岁”的口号下，对中国文革的反省却回到了法国革命的出发点。反省者毫不保留在赞成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52）人类的根本问题正相反，人类的愚妄恰恰在于：第一，本是有缺陷的（道德和理性），自己却加之于自己一种成熟状态，一种自以为神的狂妄；第二，这种自以为是的目的首先在于成为别人的启蒙者，然后在于攫取被启蒙者的精神崇拜和物质奉献；第三、人类一直成熟地犯罪，但有时候故作不成熟姿态（故作小儿状或与怂恿“小儿”站在“三大革命”的前线），乃是为这犯罪寻找免除责任的藉口。启蒙思想的无知或伪善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然而，权利意识根本不需要唤醒，这是人的罪性或第二天性；人们有时候放弃权利要求，恰恰是因为他们成熟地进行了理性的盘算而不是因为愚昧无知。第二、宣称要唤醒别人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乃是要唤醒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意识，从知识权力直到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启蒙思想的谬误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事实错误。人类的灾难绝大多数来自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却不愿意“运用自己的谦卑”。第二、真理错误。启蒙的逻辑前提是：启蒙者本身是理智者、是精神导师，但这一智力优势完全是一种自以为是，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这种智力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思潮是所有现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基础。事实和真理正相反：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在神以下都是蒙昧者；但人有神的形象，但这形象不表现在启蒙别人，乃是顺服真理和爱人如己。悲剧在于，本是瞎眼的却要为人领路，而其“理智”目标并非自由，乃是不择手段地获取领路人应得的各种回报。权威和食物，无限的权威和无限的食物，这是所有启蒙者打算向被启蒙者

或草丛下面的猪索要的全部礼品。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是文革全部口号的注解。这句口号几乎等于说：“要不理智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事实上，无论怎样运用理智，勇气和理智都无法分辨它所运用的是纯粹理智还是混合勇气的理智、超人意志或非理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勇气所追求的目标同样是利益最大化——权威和无限的权威。托克维尔在另外一个地方精确地反对了这种狂妄：“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至于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他的权力相等的”。（53）托克维尔的“上帝”不是一个逻辑假设或先验判断，而是创造者、主权者、审判者和救赎者；他不是存在者，乃是一切存在的原因。托克维尔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乃是因为来自启示真理，来自人的“勇气”在绝对真理面前的折服。缺乏在真理面前的谦卑是真正的蒙昧，连基本是非都是无知的，而且善恶不辨，缺乏“分别为圣”的意愿和能力。神是人类唯一的启蒙者。文革继续上演的根本原因是：愚妄人继续做启蒙之神。

无神论是人民的鸦片。启蒙是这鸦片绽开的骄傲之花——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及文化大革命，不过是骄傲之花在灾民或亚灾民沃土中结成的罪恶之果。文革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的骄傲，就是不知道羞耻。但基督教并非只有基督教，是骄傲的葬身之所。道成肉身至少为文革灾民宣明了两条悔改得救之路：第一，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马书 12：3）；人算什么，“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路1：51）。第二，“不要看任何人为无价值的，因为基督为他（她）而死”。（54）

2006年3月下旬于蒙特利尔

注释

1. 艾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何兆武, 许振洲, 彭刚译, 《法国革命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2. 参见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4年版。

3. 余英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序, 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4. 余英时转引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1993, 第281页。

5. 徐友渔《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 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6. 参见《痛苦的革命: 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斗争》*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拉娜·米特尔 Rana Mitter 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参见胡星斗《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一文, 转载美国中文网站“议报”。

8. 参见郅元宝《现在的工作》,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

9. (法) 沙百里 (Jeancharbonnier), 《中国基督徒史》, 耿生、郑德弟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0. (意) 柯意霖 Gianni Criveller 著, 《晚明基督论》, 王志成等 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1. 参考生命季刊杂志总第十一期《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作者, 汉芮。

12. 《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1、94页。

13. 参考《生命季刊》杂志总第十一期“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作者汉芮。《东

正教会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殉道史》Dionisy Pozdnyaev 著，陈爱洁译，真理论坛网站。

14.《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15.“非基运动相隔材料和资料参考《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份子》史静寰、王立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法）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著，耿升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土基督》，郭卫东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基督教简史》姚民权、罗伟虹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吴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胡卫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下同。

15. 参见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出版。

16. 参见赵天恩相关著述：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华神出版社，1983年。Wise as Serpents, Harmless as doves Christians in China Tell Thee Story , CMI, 1983。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评论，中福出版社，1993。灵火淬炼——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秘诀，中福出版社，1993年。《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赵天恩、壮婉芳 著，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社，1997。

17. 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第16页，参注29。

18. 同上，第28—29页。

19. 同上，参第53页。

20. 参见《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出版。

21. 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第101页。

22. 同上，第115页。

23. 参见：《大跃进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作者魏紫丹，原载议报。

24. 李锐《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七六期。

25.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D. Gale Johns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26.《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7.《“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作者陈东林，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09页。

29. 赵天恩、壮婉芳 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社，1997年，第147—148页。

30. 同上，第142页。

31. 同上，第142—144页。

32. 同上，第199页。

33. 同上，第197页。

34. 同上，转引第205页。

35. 同上，第187页。

36. 参见胡平、徐静《她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原载《三月风》2003年第8期。

37.《20世纪中国全纪录》，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编辑，北峪文艺出版社，1995年。

38.《被褻渎的青春——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作者巴山，转载《议报》。

39. 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第245页。

40. 参见《迟延的盼望——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Hope Deferred: A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American Culture, Wright Doyle 戴德礼著, 沈裕民 译。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出版, 第 235—244 页。

41. 参见《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见证、文集》, 美国生命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下同。

42. Der Romerbief, Karl Barth, Theologische Verlag Zurich, 1922. Logos and Pneuma Press, 第 54、56 页。

43. 参见《毛泽东论宗教信仰自由》, 转于“中国妙音佛法线上”网站、“上海反邪教(71)协会”网站、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人权”网站。

4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第 700 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第 22 页。

46. 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47. (美) 邓恩 George H Dunne 著、余三乐、石容译, 《晚明基督会士: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48.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著, 林骧华译 台北: 时报出版公司, 1995 年。

49.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冯棠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50. Gustave Le Bon, 1841—1931,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51. 参见艾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何兆武, 许振洲, 彭刚译, 《法国革命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52. 康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5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董国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54. The Daily Study Bible: The Gospel of Luke, William Barclay, 1985。

□ 原载《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香港, 田园书屋, 2007 年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